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2-17

2012年4月26日

\*\*\*\*\*

## 國際友人筆下的中國國家形象傳播

軍事科學院 鮑世修

在中國近現代史各個時期，都有大批國際友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進步事業，他們中的不少人，不顧個人安危，帶著一支公正、客觀的筆，來到中國，深入到社會基層和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鬥爭的第一線，向世界報道、介紹中國的實況，從而贏得國際上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新中國成立後，又有大批友人，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熱心地把中國的新變化和新經驗，以生動的筆觸，推向國際社會。他們為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正確形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他們在這方面所做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我們有責任進行認真研究，以從中吸收教益。

“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作為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已客觀存在了許多年，但長期以來卻一直沒有人這樣明確地提出過。至於，還要把它作為一個課

題來專門加以研究，則更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情。為了能做到比較客觀、全面地觀察到這一發生在中國的國際社會歷史現象的全貌，我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展開之初，就先把兩個重要概念，做些大體規定。一個是“國際友人”，它是廣義的；簡單地說，它是指那些在個人的寫作和言談中，如實、公正地報道、反映中國各個時期代表社會進步的各種力量和代表正義事業的一切相關活動的外國朋友。另一個是“國家形象”，它也是廣義的，係指一切能集中體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意志，並能代表各個時期社會進步方向、人民大眾利益的各類形象載體。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需要再在課題研究啟動之初，就加以說清的。這就是，儘管“國家形象”，作為一個理論研究對象或專用術語，是美國學者布丁（Boulding K. E.）在 20 個世紀 50 年代才正式提出來的，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總有被別人對自己和自己的民衆的所有相關信息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認知的評價，而且這種認知和評價又往往總是會在一定的範圍傳播開去，這一事實，則是早已就客觀存在了的。

最後，有一點，也需要在一開始就交代一下。遠的不說，就以鴉片戰爭以後的這一百多年來看，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抗擊外侮、爭獨立、求解放、追求進步和堅持改革開放等英勇果敢業績、敢於仗義執言的外國朋友，其數量必須以千百來計，但輪到在本文列舉陳述時，則只能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代表，當然這就難免要掛一漏萬。

## 一

國際友人筆下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從縱的方面看，在中國

近、現代歷史上源遠流長；而從橫的方面說，則在世界範圍有著廣泛的深遠影響。

早在 19 世紀中葉，即當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竭力向外擴張、大力推進殖民主義侵略政策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深切的同情關注著亞洲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歷史命運。英國是當時最大的殖民帝國。它運用經濟滲透和軍事進攻兩手，大肆掠奪亞洲國家，中國則是其推行侵略擴張的首要目標，它於 20 世紀 40 和 50 年代先後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堅決反抗，並展開了打擊入侵者的頑強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英帝國的這種強盜打劫行為深惡痛絕，他們通過相關媒體，發表了大量時評文章，歌頌中國人民誓死抵禦外侮的不屈不撓精神和他們在對敵鬥爭中顯示出的出色的聰明才智，鞭撻英國殖民者掠奪和侵略的罪惡行徑，揭穿西方御用報刊隱瞞真相、欺騙讀者、為侵略者張目的種種陰謀伎倆。由於他們這些斥責強權、扶持弱者、伸張正義的文章不僅發表在歐洲媒體上，而且在美洲報刊也有登載，從而在世界範圍宣揚和傳播了中國的正面國家形象。

舉例來說，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 年）是英帝國主義蓄意挑起的。1856 年 10 月，它藉口亞羅號事件，進犯廣州，炮轟城市，掠殺居民，焚燒房舍，犯下了一系列令人髮指的罪行。而英國政府及其御用喉舌在這種情況下卻反把引起這一切的責任強加到中國一方，馬克思懷著極大的革命義憤，站在維護中國國家和人民權益的立場上，痛斥英國殖民者發動的這場“極端不義的戰爭”。在〈英中衝突〉一文中，為了使讀者瞭解事件的全貌，馬克思詳細摘引了當時英中雙方外交照會的主要內容，據理證明

“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是在英國人方面”。<sup>1</sup> 而在另一篇〈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的評論中，他又清楚地描述了中國兩廣總督葉名琛不畏強暴堅決捍衛主權、堅定得體地處理了亞羅號事件的全過程，從而有力地駁斥了英方在戰爭起因上所散佈的許多誣蔑中方的不實之辭。

同樣，英國人對中國的瘋狂入侵和恣意掠奪，也引起了恩格斯的無比憤慨。他在許多時評中，嚴厲譴責英國大肆推行炮艦政策的卑劣行徑和揭露其既貪婪又兇殘的醜惡嘴臉。他認為，英國一而再地動用龐大艦隊入侵中國，是它固有海盜本性的最好流露。恩格斯稱英國侵略軍為“向毫無防禦的城市開火、殺人又強姦婦女的文明販子們”，是“作戰是自始至終採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sup>2</sup> 的海盜，而對敢於同這幫外來的殘暴匪徒進行英勇鬥爭的中國軍民則表示了極大的敬意。他指出，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了中國人民抵禦外敵入侵的普遍起義，而且是一種帶有絕滅戰性質的起義，一種保衛社會和家園的戰爭，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他稱讚 1842 年中國防守鎮江的駐軍寧死不屈：“這些駐防旗兵總共只有 1500 人，但卻殊死奮戰，直到最後一人。”<sup>3</sup> 而在談到 1856~1857 年戰爭期間中國民衆誓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決心時又說：“連乘輪船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個放洋的輪船上起來騷動毆鬥，奪取輪船，他們寧願與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願投降。”<sup>4</sup>

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 19 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民在抵禦外侮

---

<sup>1</sup>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4 卷，戰士出版社 1981 年，第 62 頁。

<sup>2</sup>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4 卷，第 92、86 頁。

<sup>3</sup>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4 卷，第 86 頁。

<sup>4</sup>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4 卷，第 92 頁。

中所表現出的民族覺醒寄予了厚望，他們預見到：這種覺醒必將給中國社會帶來鉅大變革，並促使這個古老的民族釋放出驚人的革命潛力，從而推動整個亞洲乃至世界走向更加進步的明天。例如，在 1857 年 6 月 5 日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就指出，中國人民在抗英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高度覺醒和熱情，預示著“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sup>5</sup> 而馬克思在 1853 年發表在同一份報紙上的一篇文章中，則論述了中國革命對歐洲革命可能帶來的影響。

2011 年是辛亥革命 100 週年，發生在一個世紀前震驚中外的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它所展現出的中國國家形象，首先也是通過當時國際輿論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傳播到我們星球的四面八方的。這裡我想提一提其中兩位最為知名的人物。

一位是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1862~1920 年），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在清末民初親歷和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著名事件。莫理循在 20 世紀初的北京政壇與西方新聞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通”，他來自第一時間的獨家新聞，使《泰晤士報》成了報道中國消息的當之無愧的權威。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湖北武昌發生的起義，使來自中國的消息一下子佔據了世界許多大報的頭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憑藉他的職業敏感，敏銳地意識到這一新聞的鉅大價值，在 11 日，便向報社的倫敦總部發出電文：“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極度驚慌之中……”莫理循是第一個以“革

---

<sup>5</sup>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 4 卷，第 94 頁。

命”這個詞向外部世界發出關於推翻了中國二千年的封建統治的武昌首義報道的西方記者。當時的西方對武昌起義持審慎的態度。《泰晤士報》國際版編輯在刊發莫理循的電訊時，刪掉了“革命”這個詞。可莫理循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仍舊寫道：“我所遇到的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與中國有聯繫的外國人，都私下裡告訴我同一件事：他們希望革命取得成功。”10月和11月間，他給《泰晤士報》總部總共發了八千多字的電文，他在英國國內的朋友給他來信說：“您的報道又一次在倫敦贏得了讀者。”這位深諳中國國情的莫理循就這樣，第一個向世界宣佈：1911年10月在武昌發生的起義是一場革命。

另一位則是埃德溫·丁格爾（1881~1972年），英國人，傳教士、新聞工作者、作家、心理學家。1903年3月來到中國，給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丁樂梅。

辛亥革命爆發後，丁格爾是第一個到武昌採訪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記者。他當時是上海英文《大陸報》的特派員，從事戰地採訪。由於同黎元洪的私交甚好，他得以深入到革命爆發地武昌的任何一個地方，廣泛瞭解革命地區的主要活動。1912年4月，丁格爾出版了他認真解讀辛亥革命的一本書《中國革命記：1911~1912》，在上海、倫敦、紐約同時發行。該書出版的時間距辛亥革命爆發不到半年（作者的出版前言寫於1912年4月），反映了一個西方記者對時局的實地觀察，真實傳達了在華外國人的想法和感受。

丁格爾對革命黨人抱有較多的同情，對中國人民也有很深的感情，書的扉頁上就寫著：“謹以此書獻給那些獻出生命的志士及新興的群體，希望他們為自由進行的鬥爭將預示著中國公正與正直之日的到來。”由於接觸過大量革命軍軍人，再想想過去那

些舊兵痞的所作所為，他感受頗多：“革命部隊的表現是整個革命中最值得注意的景象。”他在對新舊軍隊進行一番對比後說：“在黎將軍領導的革命中沒有這些事。整個革命期間，革命軍的部隊無論是否受過訓練，都有良好的舉止，每一個關注這次起義的人都對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丁格爾對中國的未來及其對外部可能產生的影響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他寫道：“如果中國人擁有了極大豐富的知識和高質量的工廠，這個國家將會進步，並能使全世界隨著它進步，這一天必定會來到，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sup>6</sup>

除關於辛亥革命的報道外，丁格爾還寫過其他一些介紹中國情況的書，如《徒步穿越中國》、《我在西藏的生活》等。

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大地上，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動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作為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

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交織，社會動蕩不安、民不聊生，外敵瘋狂入侵，國家存亡、危在旦夕。中國人民則正在這個國家的一支進步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抗爭，處境十分艱難而險惡。正是在這樣一個危急的時刻，西方一批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出於個人的良知和對中國人民苦難遭際的同情，以及對正義事業的奉獻精神，他們不避風險、不顧自己的安危，長途跋涉，來到中國，廣泛接觸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親眼目睹外國侵略者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摧殘、大好河山的蹂躪和無辜人民的殺戮，無不義憤填膺、嫉惡如仇。為了讓西方國家乃至全

---

<sup>6</sup> 此段所有引文均來自〔英〕埃德溫·丁格爾著、劉豐祥等譯：《辛亥革命目擊記——〈大陸報〉特派員的現場報道》，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世界公衆瞭解中國人民進行堅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戰爭的真實情況，他們決定突破中國當時在位的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深入到一貫堅持抗日主張、實際領導全國軍民對敵浴血奮戰的中國共產黨總部所在地延安，展開對那裡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家的訪問和攀談，進而深入到廣大軍民對敵鬥爭的第一線——敵後戰場進行採訪，搜集大量生動的第一手材料，然後把所有這些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感同身受的個人體驗和認識，迅速整理成書面報道或編撰成書，通過媒體或圖書發行渠道，在全球範圍廣為散佈，讓世界公衆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從而從正面傳播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這批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在中國西北地區、因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抗擊外敵入侵的真實業績而蜚聲國際輿論界和政論文壇的西方知名記者，後來都成了中國人民最親密的國際友人，而他們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則是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夫婦。

埃德加·斯諾（1905~1972 年），美國新聞記者、大學講師、作家。他於 1928 年來華，1936 年 6 月在宋慶齡的協助下到達延安，見到了周恩來，並與之進行了長談。7 月 15 日，斯諾受到毛澤東的正式邀請到他的窯洞裡談話。主人全面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可以結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澤東的談話，開宗明義，簡潔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諾的心。一連數天，毛澤東與斯諾交談，談到的話題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問題、戰略戰術問題、組織和武裝民衆問題、內政問題、中共同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其後，斯諾在保安又先後採訪了中國共產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考察了蘇區，更重要的是，斯諾通過十幾個晚上的交談瞭解毛澤東的個人歷史。經



過撰寫、翻譯、訂正，斯諾帶出發表，這就是後人看到的唯一的由毛澤東自述的《毛澤東自傳》。

10月12日，斯諾戀戀不捨地告別了置身四個月的蘇區。返回北平住所，投入到採訪資料的整理工作。不足半月，斯諾即在對中國影響較大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分期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隨後，上海的《大美晚報》予以轉載。1937年，斯諾撰寫的文章先後在國內外六家報紙刊登。同時，斯諾多次參加報告會，以令人信服的事實客觀地準確地向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介紹了中共蘇區的情況，使人們第一次真正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毛澤東，瞭解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為此所做的種種努力，國際影響鉅大。1937年10月，斯諾在北平寫成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出版，引起極大轟動。斯諾通過這本書，把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民的苦難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真實展現在世界人民面前，而這一戰地報道，也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此後，又被世界各地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在國際上已產生鉅大影響。半年後，此書的中譯本在中國出版。此書一出，不啻一聲春雷，競相爭購，一版再版，不敷需求。斯諾在序言中說：這本書有一種不可征服的精神、一種力量、一種慾望、一種熱情，但這一切不是作家創造出來的，而是書中這些人，“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一時間，中共蘇區成了全世界有識之士的關注熱點，外國記者先後進入蘇區。

今天，我們從斯諾在序言中所說的上面的這些話，也可以清楚地體會到，《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向世界傳播的，恰恰正是中國民族精神的聚焦和光輝的國家形象。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傾向日益嚴重。同年9月，斯諾

第二次進入蘇區。在延安，斯諾見到了毛澤東和不少中共領導人，考察了延安的工農業生產、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等，再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這次考察，斯諾更加堅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希望之光。1939年末至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反共高潮，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斯諾深感痛楚，同時因與妻子分離已兩年，於是回到了美國。斯諾回國後，時時想繼續為中國的事業盡力。當時，美國國內和平空氣甚濃，但斯諾預言戰爭事態將擴大。起先，他不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指責，但珍珠港事件之後，羅斯福總統熱情召見斯諾，就美國如何與中國建立關係問題，徵求他的意見，並於1944~1945年先後三次召見斯諾。在援蔣失敗後，斯諾遭到排斥、打擊，被迫舉家遷居瑞士。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先後三次長期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為中美關係的和解做出了貢獻。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病與世長辭。遵其遺囑，他的骨灰安置在他曾生活過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漢白玉墓碑上鐫刻著葉劍英的手跡：“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這一時期，運用自己的筆，熱情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另一位知名人士，是海倫·斯諾（1907~1997年），美國新聞記者、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位妻子，《續西行漫記》一書作者。

海倫1931年8月來到中國，翌年冬天與埃德加·斯諾結婚。在中國，他們先後結識了宋慶齡與魯迅。1937年，海倫獨自訪問延安。在延安近五個月的時間裡，她廣泛接觸了陝甘寧邊區的戰士、工人、農民、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學生；更重要的是，她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採訪到的紅軍領導人的情況，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埃德加·斯諾離開蘇區後與中共紅軍勝利會師的紅二、

四方面軍的指揮員。海倫採訪了不下 65 位有名有姓的人物，還為其中的 34 人寫了小傳，特別是同毛澤東進行了五次難忘的長談。她的採訪，不僅大大充實了丈夫正在撰寫、修訂的《紅星照耀中國》，而且還寫成了堪與《西行漫記》相媲美的姐妹篇《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

海倫一生創作了 40 多本書稿，其中有十多部與中國有關，主要作品有：《紅色中國內幕》、《西安事變記事 1936》、《我的中國歲月》、《中國共產黨人：老游擊隊員的素描和傳記》和《紅塵：中國共產黨人的自傳》（中譯《革命人物傳》）等。而這些書所宣揚的，全都是一些為中國的獨立和解放事業殫精竭慮、用盡心智、奮不顧身的人和他們的事。20 世紀 70 年代，她又兩次重返中國，再度以其敏銳觀察和真實記錄，熱情讚頌了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偉大變革。

在這同一時期，即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最初 30 年，活躍在中國這塊大地，通過報道中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等各方面諸多可歌可泣、驚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從而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西方進步記者和作家，除斯諾夫婦外，也還有不少，如艾格妮絲·史沫特萊（1894~1950 年）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 年），就是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兩位。她們兩人都有自己曾特別引起過轟動效果的報道文獻。史沫特萊有一本介紹朱德生平的《偉大的道路》，斯特朗有一篇《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是她對毛澤東主席的訪談稿）。這兩篇著作各自從不同角度向外部世界傳播了中國國家形象。

再有，像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20 世紀 30 年代，曾在中國上海向海外撰寫了大量宣傳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文章。而原係美

國聯合社駐中國記者的波蘭裔美國友人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1939年就直接參加了“保衛中國同盟”；抗日戰爭期間他做了大量向世界推介中國陝北地區“紅色中國”真實情況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決定留在中國，長期以來，為如實向全球展示中國的國家形象，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中國進入下一個時期，即改革開放以來的這30多年，通過自己的筆墨耕耘、熱情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外國朋友，更是越來越多。這裡，我想只舉兩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個例子來自一位名叫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美國人。讓我們先看看相關詞書對他簡要情況的介紹。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博士，著名投資銀行家、公司戰略家、慈善家，同時還是科學家、作家、編輯、電視系列節目主持人。與中國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並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係，將中國文化傳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同時，他還在國內和國際媒體上就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現狀發表評論。他寫作、編輯了《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走近真實：挑戰現有理念》、《中國製造：新革命的聲音》等25本書。他一直致力於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尤其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的中文版，是2005年2月出版的。這本書詳盡介紹了江澤民的人生歷程，並對江澤民擔任中國主要領導人的十數年進行了總結和評述，著重敘述了1989年後，在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出現難題的形勢下，他如何領導全國人民，保持社會穩定，加速經濟發展，並最終使中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性轉變。在國際政治方面，該書敘述了江澤民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努力把中國塑造為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備受尊重的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和外交大國。書中還披露

了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始末，例如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南海撞機等事件中，江澤民運用其政治智慧，堅持國家立場，維護民族尊嚴，疏導公眾情緒，平穩化解危機，保持社會穩定的經過。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評價此書“生動刻畫了在一個特殊的變革時期，領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形象”。

2008年，就在中國人民興高采烈地歡慶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時，庫恩的另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又應時問世。

外國人通常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完全集中在經濟領域……如果你瞭解中國，你就會知道，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最重大的變化，是中國人的精神的轉型，還有越來越廣泛而深入的個人自由。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在各地區之間如何迥異，這種複雜性通常來說並沒有引起外國媒體的真正重視，但正是這些差異，讓世人看到了中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質疑很多外國人對中國所持的那種普遍簡單化的觀點。

對各國讀者來說，避免誤會、減少曲解的途徑之一，就是領會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

上面這三小段話，我轉引自庫恩這本書的序言，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寫這本書的一個重要著眼點：一定要給予西方公眾一個正確鮮明的中國國家形象。

另一個例子則是出自一位名叫格雷戈爾·班國瑞的英國人。他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一位長期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資深學者。2008年，他主編了一本叫《傳記還是杜

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書，<sup>7</sup> 引起了我的分外注意。他的這本書，是針對一本竭力妖魔化新中國第一代國家領導人、惡毒詆毀中國國家形象、自 2005 年以來在世界廣為流傳、造成極惡劣影響的傳記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英國喬納森·凱普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而編撰的。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主要作者張戎（另一作者是她丈夫喬·哈利戴），是一個 1952 年出生在中國四川、1978 年公派出國留學後留在英國的學生，後來成了一名國際上的自由撰稿人。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她為了泄私憤、謀私利，採取無端編造、歪曲事實、惡意中傷的手法，不惜數典忘祖，對她所編著一書傳主的攻擊誹謗，真的是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從而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少有良知、重事實、講公道、主張客觀公正看待毛澤東一生業績和作為的專家學者的不滿和質疑。

班國瑞教授，正是出於對這種完全不尊重歷史、恣意顛倒黑白、挾私報復、借醜化別人為自己在國際輿論界造勢、博取廉價吹捧、大肆斂財的惡劣做法，深惡痛絕，感到有必要聯繫國際史學界對近、現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過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來共同應對這一對正直史學家寫作良知挑戰的醜惡現象，就張戎這部書的種種觀點，從各自不同角度，據理予以駁斥，以正視聽。

班國瑞教授指出，《傳記還是杜撰？》一書的作者們：

……揭示了張戎和哈利戴如何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根據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

---

<sup>7</sup> 格雷戈爾·班國瑞、林春編：《傳記還是杜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8 年。

則完全無視；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事實；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引用資料斷章取義；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破除”的一些“神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震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貨等等。<sup>8</sup>

班國瑞教授編撰的這本書，不僅指出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怎樣違背了撰寫人物傳記應恪守的起碼要求，而且也清楚說明了客觀公正地撰寫傳記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寫道：“歷史著作的寫作，需要像虔誠的教徒那樣尊重史實，尤其是那些據說會顛覆先前偏見的史實。它需要根據歷史背景對相關歷史證據和歷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評判。而人物傳記的寫作，則需要對人物的情況有全方位的把握，對傳主的認識要具有一致性和整體性，並能夠設身處地地去理解他為什麼要那樣做。”<sup>9</sup>

當然，《傳記還是杜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們對張戎書中各個論點從內容到寫作手法的具體批駁和斥責，沒有必要在這裡一一展開，僅從上面援引的班國瑞教授那兩段提綱挈領、直奔張戎著書險惡用心和卑劣手法的公正評語中，我們就不難看出，張戎那本長期以來在西方國家

---

<sup>8</sup> 格雷戈爾·班國瑞、林春編：〈前言〉，《傳記還是杜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8~9頁。

<sup>9</sup> 格雷戈爾·班國瑞、林春編：《傳記還是杜撰？——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8~29頁。

書肆受盡吹捧、一直位居國際暢銷書榜首的“成功之作”，這次受到了多麼沉重的打擊；同時，我們也深深體會到，像班國瑞教授這樣為還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本來面貌、主動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國際朋友，對我們在國際上維護中國的、正確的國家形象，是多麼的重要。

## 二

以上，我把自鴉片戰爭以來這近 170 年中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友人筆下在世界範圍得到四處傳播的細枝末節，進行了大體的梳理；我把由此而形成的一幅充滿人間大愛的瑰麗歷史畫面看作是：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因為發生在中國大地，所以它更值得中國的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去認真考察和研究。

“國家形象”，如果要我來做一個最通俗的解釋，那就是：外部世界看你這個國家時得出的最鮮明印象。“國家形象”，它本身是虛擬和抽象的，總得通過一定形式的載體表現出來，而且這種載體有動態的，也有靜態的。一個國家，它那得到全民擁戴的國家領導人，由於他（她）代表了本國人民的意志和體現了這個國家精神層面上的最高追求，因而他（她）自然也就成了這個國家國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載體；再如，一個國家為抗外侮、爭獨立、求解放前赴後繼，不惜殺身成仁、為國捐軀、為民爭利而湧現出的龐大英雄群體，由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追求的都是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整個這一群體也就可以看作是全民族的脊梁。因而，衆多國際友人對中國不同時期的革命領袖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個英雄群體的所做的客觀、真實而又感人的報道，應



當說，都是對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範圍最有力、最有影響的傳播。

下面，我想就“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在這裡做個初步簡要考察和分析。

（一）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與我們自己在這方面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果，有哪些不同，它的特點在哪裡？

簡單扼要地說，他們所做的傳播，擴散面大而廣，速度快，公信力強，影響深遠而持久。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效果，原因大體有以下一些。

1. 這裡所說的國際友人，都是來自國外的、主要是西方的記者和作家。西方的讀者對他們有著一種自然的親近感。他們關於中國事件的報道，容易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和相信，並較易贏得廣大讀者的同情和支持；同時，也可避免受眾把中國人對自己的報道視為“王老二賣瓜”而加以抵制的情況的發生。

2. 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運用的多係國際上最有影響的主流媒體，也是強勢媒體和出版渠道。這些媒體發行量大，覆蓋面廣，傳播快，一些出版機構也都極具活力。

3. 直接用西方讀者通曉的語言——英語寫作。這極大地便利了受眾閱讀。

（二）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在歷史上都起過一些什麼樣的重要作用？

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它的作用，籠統地說，就是通過不斷向外部世界如實介紹中國的情況，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瞭解、同情和支持。但如果認真細緻地思考一下，那就會感到，遠不是那樣簡單。

1. 在中國的革命和進步力量處於被圍困的時期，是他們突破中國反動當局的嚴密封鎖，向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扇能夠如實瞭解

中國的窗戶；而在中國國家的建設時期，又是他們竭力抵擋那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對新中國的惡意扭曲，努力用自己的筆，給外部讀者送去了一幅健康向上的中國圖景。

2. 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中，他們同新中國老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建立起了一種彼此高度理解和信任的私人關係，而這種關係上昇到國與國之間層面，就得到了進一步昇華，從而竟能使他們筆下的傳播文字，神奇地轉化成一種力抵千鈞、實現國與國之間重大外交戰略的推動力量。

回想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中國為同美國實行正常交往、建立外交關係，正是由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面，通過長期以來跟中國關係密切的國際友人，及時傳遞了相關信息，才終於使尼克松訪華得以順利實現。具體來說，美國尼克松政府當局，正是看了斯諾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對毛澤東的訪談文章，才迅速決定讓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斯諾透露了主人對他說過的這樣幾句話：歡迎尼克松到中國來，不論是作為遊客，還是作為總統——他上了一架飛機就可以來。

3. 衆多國際友人當時向世界所做的關於中國實際情況的報道，今天來看，它們的歷史文獻價值都是十分鉅大的。因為，這些報道記錄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以及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在尋求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中所經過的歷程。他們當時留下的這些記實隨筆，不少已被公認為是瞭解中國近代史的必讀課本。

4. 不少國際友人關於中國革命和對敵鬥爭的外文著述，由於其明顯的進步性質，往往很快就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從而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讀者，促使他們積極地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中去。

（三）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在我國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的整個事業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我的回答是：處於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從歷史上看，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通過結交一些同情中國人的苦難遭際、認同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的愛國愛民主張、為人正直、賦有正義感並具有進步思想的外國記者和作家，來加強我黨、我國的對外傳播工作，以擴大我國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一貫十分重視。

回顧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後，日寇大舉入侵，已是指日可待之事。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人急需突破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將自己的抗日主張和決心以及陝北地區軍民實行民主改革、積極抗日備戰的實際情況傳播出去，但當時自己卻沒有用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因而很快想到借助外國有良知的記者和作家來幫助完成這一艱鉅的任務。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把這一結交外國媒體圈的進步朋友、擴大和傳播“紅色中國”在世界的影響的做法，是作為我黨整個外宣策劃中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來加以對待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都曾多方設法，邀請西方記者到陝北訪問，並以高規格熱情給予接待，與他們促膝談心，推心置腹地就中國和世界大事以及各方面的突出問題坦誠交換意見，從而結成深厚友誼。這裡特別要提一下的是，毛澤東與斯諾夫婦、朱德與史沫特萊女士之間的真誠交往及其帶來的碩果，堪稱中國共產黨人結交西方新聞界進步朋友在傳播國家形象上取得明顯效果的兩個範例。

2.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些知名的憂國憂民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也都很重視通過西方新聞界進步的朋友向世

界傳播一個真實的中國國家形象。為此，他們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細緻工作。

宋慶齡和魯迅，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他倆為實現這一目的而做的努力，可以從相關國際友人的言談中得到證明。比如，埃德加·斯諾就曾對 20 世紀中國的名記者蕭乾說過：“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慶倖自己能在上海結識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而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則說，魯迅“是我在中國生活中給予我最有力影響的人”。

從實際情況看，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一些激進的西方記者，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進入陝北地區，對“紅星照耀下的中國”進行廣泛採訪和報道，首先就是由於有了宋慶齡女士的指引、安排和暗中護送。

3. 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國誕生以後，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作為國家整個對外傳播事業的一部分，過去所產生過的影響，今天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以及今後如何進一步推動、發展等問題，全都提到了議事日程。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在黨中央和國家有關領導人的關心下，特別是在幾位自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通過國際友人對外傳播國家形象事務的、我國外交戰線的老領導的精心設計、策劃下，終於在 1984 年 9 月成立了“中國三 S 研究會”。“三 S”指的是斯諾夫婦、史沫特萊和斯特朗四位在對全球傳播中國紅色國家形象最具影響力的美國進步記者。鄧穎超在給中國三 S 研究會成立大會的賀信中，對他們四位為傳播一個真實的中國給世界所做的付出，作了這樣的評語：“三 S 為中國各族人民所作的貢獻是難能可貴的，也是難以估量的。”

後來，為適應國際友人研究工作發展的需要和加強對外交流，

中國三 S 研究會於 1991 年 3 月更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在成立大會上，黃華會長對研究會的任務做了以下概括：“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將著重研究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較大貢獻的國際友人，使這項工作不但饒有意義，而且更加豐富多彩。我們要通過研究和介紹他們的事跡和著作，弘揚他們的優秀品質和獻身精神。我們要擴大同國外友人的聯繫，促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友誼與合作……” 本著以上宗旨，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成立十幾年來，做了大量整理、研究我國國際友人豐富業績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對他們在傳播中國國家形象方面所做出的種種出色努力。

（四）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作為中國對外傳播事業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學術研究領域，今天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當務之急，應當做點什麼？

在構思這篇文章執筆之初，我就已經指出：“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作為人類良知追求進步和公正的一種國際社會現象，已客觀存在了許多年，但長期來卻一直沒有人這樣明確地提出過。至於，還要把它作為一個課題來專門加以研究，則更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情。

前面，我雖然提過，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多年來對三 S 報道中國的大量文獻曾做過一般意義上的整理和研究，但那卻不是從傳播學角度進入的。隨著對外傳播學這一學科近一、二十年的新發展，“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應專門作為這一學科的重要課目，由專人來進行有組織、有目的、有深度的綜合研究。

這一課目的研究內容，從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看，是十分豐富的。它實際是一個介於傳播學、外交學和當代歷史學之間的邊緣

課目。今天研究這一課目的目的，當然，不僅是緬懷國際友人為向世界傳播中國國家形象怎樣付出無比辛勞和做出突出貢獻，而更重要的是，考察他們所做傳播在國際輿論、時事、外交界以及廣大讀者中所產生的、那種遠不是國人所能企及的鉅大作用；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通過結交國際上的新朋友來進一步推動國際友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更廣泛傳播。